

大纲

两种行动研究与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策略

郭伟和 博士 教授
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
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教研室主任

- 两种行动研究策略：注重专业效能，还是批判反思？
- 行动研究的共同的反思实践性特点
- 反思实践研究的有效性
- 反思实践研究的资料类型
- 反思实践研究的资料分析
- 行动研究对中国社会工作的关系

一、两种不同行动研究类型

- 行动研究有两种亚类型：追求有效性的行动研究和追求觉醒和解放的行动研究。
- 以美国职业教育家唐纳德·舍恩(Donald A. Schön)、澳大利亚社工专家简·福克(Jan Fook)和英国的迈克尔·谢帕德(Michael Sheppard)为代表的注重职业行动的效果的反思实践研究，或者说为了培养实务人员的职业能力(expertise)，成为职业专家(expert)。
- 这派的行动是沿着柏拉图的概念，来理解实践智慧，强调把非言说性技艺性活动阐明，转变成为言明的实践知识。于是如何处理普遍性知识、出境性知识和过程性知识，最后达至个人性能力，是这一派行动研究的核心。
- 另一种类型的行动研究是以巴西教育家保罗·弗勒雷(Paul Freire)、美国女性主义实践研究家帕蒂·拉瑟(Patti Lather)、法国社会运动研究大师阿兰·杜汉(Alain Touraine)为代表，注重个人觉醒和社会转变的批判实践研究，或者说是为了寻求人际关系和社会结构转变的社会目标。
- 这派研究可以说是继承了马克思的批判解放主旨，但是又放弃了马克思传统中的阶级代言人的历史命定，而是结合当代社会碎片化、去组织化特征，具体考察每个群体自身的历史背景、社会位置和言说表征，去批判反思和对话学习社会生活的文化模式，寻求地方化的集体身份重构和实践。

二、行动研究的共同的反思实践特征

- 当前在中国产生类似的亚分类的代表人物分别是：来自台湾的夏林清的行动研究流派；以及来自香港的潘毅的社会干预研究流派。
- 夏林清本来是舍恩的弟子，但是她却在实际中融合了来自批判研究的思想，侧重于职业行动中的当事人的心理情感体验以及和他的社会脉络、结构性位置的细致关系梳理，把行动效果和人际关系改变结合起来；
- 潘毅则从后现代人类学民族志转向了马克思主义，更加关注中国社会转型的阶级话语和性别话语父权体制的结合状况。
- 不管是关注效果的行动研究，还是关注解放的行动研究，都具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反思实践性(Bernstein, 2012; Burawoy, 1998; Fook, 2002; Heron, 2005; Lather, 1986)：
- 研究过程本来就是实践过程的一个环节。这里的实践概念不是前反思性惯性活动，也不是一种专业技术活动，而是一种通过反思和对话的不断觉醒和批判的社会关系转型过程；
- 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批判性反省认识自己的社会位置和主体位置，和行动框架，进而实现有效的社会行动或社会转型；

- 研究过程不一定是韦伯所说的价值中立，而是带着价值倾向积极介入到社会行动过程的热情参与者，站在弱势群体立场去引领反思和对话，促进行动更加自觉和有效；
- 研究过程收集资料的方法应是自然情境下的详细收集过程，围绕着过程模式和个案类型进行，边比较分析，边补充整理。或者用Fook的话说，是一个接触经验的多元记录过程。
- 研究过程除了要对微观情景进行反思建模，而且还要由微观情景扩展到宏观社会制度和结构，以及历史发挥过程，从而反思微观和宏观的相互建构的历史过程（Burawoy,1998）；
- 研究结论并不是为了发现理论（如扎根理论所为），也不是为了验证理论（如实证主义所为），也不是仅提供多种叙事文本（后现代视角主义），而是进行理论和实践的对话，发展理论和重构理论，从而推动实践发展。

三、反思实践研究的有效性

- 实证主义范式下，判断一个研究的好坏主要是信度和效度两个指标。信度问题往往化被简成代表性问题，成为质性研究的常常需要回答的质询之一。一般认为，质性研究不声称代表性，它只是揭示个案中存在某种规律，后者通过个案验证某个理论，但是并不试图对总体进行推论。
- 效度问题存在更大的争议。实证主义关心的是测量工具和概念之间的吻合程度。而解释主义关心的是人们行动的主观意义和理解，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概念提炼，强调的是视域融合或理解共鸣。
- 反思实践研究的效度有不同的处理方式：
 - 一种是追求多元视角的呈现，达到一种相对化效果（Fook, 2002; Heron, 2005）
 - 第二种是追求过程知识的启发性验证性（Schön,1983; Sheppard at al.,2000）
 - 第三中是追求对当事人的触发和觉醒效果，产生一种反叛的力量（Freire ,1976; Lather, 1986）
- Fook（2002）、Heron(2005)等人提出，在后现代、后结构主义范式下，反思性研究更加关注不同当事人的多重视角、多重声音的呈现，或者说多重论述模式下的主体位置的呈现。
- 这个说法借鉴了福柯的后结构主义理论，但是走向了一种绝对的相对主义，忽视了福柯理论中强调的特定时期主流叙事的非话语实践条件的共同产生的权力效果。如果说抵抗的话要么产生于主流叙事的反叙事或从属性话语，要么能够发展出来另类叙事去替代主流叙事。
- 另外，关注职业效能的反思实践研究注重的是过程的逻辑关系。他们不是反对实证逻辑，而是把实证逻辑融合到实践行动之中。比如，肖恩和谢帕德提出了一种新方法，来提升反思实践研究过程的内在逻辑。
- 肖恩认为，反思研究的内在逻辑不同于实证主义的演绎推理-普遍验证逻辑，也不同扎根理论下的比较分析的归纳饱和过程，而是融合了探索性实验、行动探测和假设检验的综合过程（Schön,1983: 146-147）。也就是最初的假设形成是一种探索，但是有了假设，就要经过行动来检验自己的假设，最后，再提出不同的假设来检验有效方案的扎实性。行动假设和行动过程并不要求做彻底的对应关系，而是只要能够做到足够强的支持就可以。

- 谢帕德在肖恩的基础上，精细化了反思实践过程，从而形成了一种比较细致的过程性知识(process knowledge)的形成方法 (Sheppard at al.,2000)。他认为过程性知识的形成步骤分为如下几步：
- 第一，培养批判性评判能力 (critical appraisal), 对于接受的资料要采取一种批判的态度来审视它们的关系，采取某种初步的因果推测；
- 第二，把批判评判和产生假设 (hypothesis generation) 链接起来。假设产生依次分为三种类型：部分个案假设 (partial case hypothesis)、整体个案假设(whole case hypothesis)、沉思性假设(speculative hypothesis)。没一种假设都需要在实践过程中收集扎实的资料来检验假设的有效性。从而保证最后提出的结论是扎实有效的。
- 但是，对于批判教育家弗勒雷 (Freire)、女性主义批判学者拉瑟(Lather) 等人，则关注的是通过对个人社会位置、以及社会结构制度的反思，来产生触媒效应，让当事人有一种不同的感悟和力量，重新理解自己过去的行为模式和心理体验，并且对未来的行动产生新的方向和策略。
- 这一派别试图融合马克思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更加关注非话语性社会条件和话语性实践二者的关系，来处理反思对话的启发触媒效应。

四、反思实践研究的资料类型

- 正如Fook (2002) 所言，基于实践的反思研究，并不是去单独收集资料，而是利用自己的实践机会，来接触实践的经验，从而产生更加丰富的资料类型。她认为，实践研究的资料包括如下类型：
- 个人经验的片段，包括一段工作经验、工作例会、工作日程等参与观察的民族志记录。
- 现存资料，包括日记、会议记录、个案资料、个案注释、工作政策、日常表格等。
- 实践解释，包括访谈、聊天、督导会、工作简要讨论会等。
- 当然对于上述不同类型的资料，不同的研究导向下的关注点不同。比如，Fook本人就比较偏爱描述性的关键事件，她认为对一个事件的仔细陈述可以展现出实践者更加自然、真实的看法，从而避免工作记录中对个案的专业化加工。这样可以反映出来同一个事件的多元视角解释。
- 但是，如果不是Fook关心的多重视角主义，而是斯特劳斯、福柯、布洛维、斯密斯等人关心的过程事件模式和权力技术，那么不同情景下的个人对于事件或个案的加工陈述方式，才是反映整个过程的互动模式或权力技术。

五、反思实践研究的资料分析

- 反思实践研究的目的是要批判反思实践过程的限制条件、个人异化和各种压制剥削性权力关系。然而，这个批判反思不是一种简单的意识形态教条，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出发，来对世界进行简单化理解，并用此真理性理解来启蒙对方。如果是这样，这就产生一种新的真理体制 (Foucault, 1979)，或者是一种灌输性教育 (Freire, 1971)。它仍然需要基于事实资料的过程事件分析以及话语分析，从而揭示出具体而微的权力技术和主体模式，进而寻找处境化的觉悟和抵抗的行动。
- 大致来说，可以分作三类资料分析方式：
- 一类是过程事件分析，也就是要就一个事件展开的过程，分不同阶段分析其各自的结构化互动模式、特点以及条件，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过程模式；
- 另一类是时空结构分析，也就是分析特定场景的空间结构，和行动时序路线，从而获得一种权力实践的时间、空间技术；
- 第三类是话语分析，分析有关特定场域、特定事件和特定对象的论述模式，如何把特定对象建构成特定的主体，体现一种什么主体位置和主体状态

六、行动研究对中国社会工作的关系

- 反思实践资料分析的原则：
 - 一是要注意参与和反馈，要把资料分析的模式反馈给研究伙伴，进行对话和讨论，引发相关的批判，达到启发和触媒的效果；
 - 二是要注意在微观情景主义和宏观结构限制之间的平衡，既要防止简单的结构主义，也要防止极端的情景相对主义；
 - 三是要注意在解释主义的视角主义和客观的政治经济条件之间的平衡，既要避免唯物主义的决定论，也要防止滑入符号领域任意漂浮。
- 当前中国的社会工作最需要澄清自己的发展脉络，以及对应的发展议题，然后提供契合性的行动研究。就发展脉络来言，中国社会工作受制于三大论述策略：
 - 一个是国家治理技术的现代化，人们虽然开始质疑周宏康时代的维稳体制，但是新治理策略不管是否能够成功民主化转型都依然是一种围绕着统治权而来的法律权利叙事；
- 第二个是新管理管理思路下的政府购买服务，打着社会组织创新的旗号，发端与深圳的政府购买社工岗位、再到广州的购买家综服务，在西方无疑是一场拆解福利体制和压制社工专业的管理技术，在中国却成为社工专业廉价雇佣市场的滥觞
- 第三个是专业化技术路线的学院派叙事总是一副争风吃醋的小媳妇形象，展现在政府的维稳体制和购买服务具体策略下。殊不知，就算是专业化技术路线能够畅行天下，也不过是福柯所谓的规训权力对统治权力的合谋与分享，又有多少是真正的社会发育的自主空间呢？
- 在此脉络下，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议题不是去借鉴一种新叙事、新技术，打造新主体、新社会安全秩序，而是如何“在中国发现历史”（借用 Paul Cohen 语言）？
- 在中国发现社会工作的历史任务，需要紧紧围绕着宏观社会转型的过程，培养基层群体的批判性思考的能力，发展抵抗性策略和另类发展策略，建构基层社会共同体，增强当事人的敏悟，通过地方叙事来追求美好生活。
- 两种行动研究策略都可以用来支援中国社会工作的自身发展历史：
 - 如果要追求专业成效，我们也需要Schön开创的行动研究学派所说的如何把普遍性知识和具体情境性知识及过程性知识结合起来，达到个人的效能；而不是仅仅提炼出和借鉴实证性普遍知识对实践情景进行裁剪，死板硬套；
 - 更进一步，社会工作的性质决定了其核心任务是社会关系调整和集体身份的重构，而不是打造一种正常主体来适合资本主义的高效运转的机制。这就意味着Paulo Freire的行动研究策略更有针对性。
- 当然，我们可以把两种策略整合起来：就一般术语来言，Schön的语言更加适合学术共同体，能够包容更多的专业人员，比如追求专业有效性，提升研究能力等等；但是其实，社会工作专业决定了其实质性议题是社会关系和集体身份问题，所谓专业有效性必须体现在能否进入社会关系，在参与社会互动中重建集体身份问题，而个体身份无非是对各种社会集体身份建构的范畴的选择、扮演和认同。所以，我们必须把专业有效性和批判反思能力链接起来，推动中国社会工作的内在发展动力。

两个研究案例：

- “社会工作实践模式：从证据为本到反思性对话实践——基于青红社工的案例研究”，《思想战线》，2012年第38卷，3期。此文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12年第9期摘编；被《人大报刊资料复印中心·社会工作版》2012年第10期全文转载；
- “From Micro-situational Making of Agency to Multi-level Reflection on Social Relation and Structure: The Case of Qing Hong Program after “5.12” Earthquake of Sichuan, China ” , *Qualitative Social Work*, 2013年12月.

“觉醒与行动：公平社会转型的微观基础——以建筑业农民工社会工作为例”，《中国社会工作研究》第九辑，2012年12月。

A preliminary exploration on transformative social work in china: a case study on social work with migrant construction workers, *China Journal of Social Work*, Vol. 5, No. 1, April 2012.